

●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试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可能转向^①

——基于知识生产三要素的分析

马健生，时晨晨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从知识生产三要素理论看，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已经到达了转向的临界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新阶段和国家发展新战略对比较教育知识的新需求使转向具备迫切性；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知识积累的丰富和实践应用的多元奠定了转向的可行性；研究队伍数量的壮大和质量的提升保障了转向的可能性。这三股转向动力正在推动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发生如下转向：研究目的与功能定位调整为“生产教育理论”和“服务国家战略”；研究技术路线变革为开展真正的文献研究与实地研究；研究人员培养转变成兼重外语语种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培训。这三大转向如果顺利实现，将会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帮助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摆脱“学科危机”，重获新生；指导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实践的科学化发展；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知识咨询服务。

【关键词】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转向；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9)09-0043-09

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学界内部不被尊重，往往被指责为学术研究水平低；学界外部甚至也开始批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提出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问题。所谓“转型”，实质上大多是指研究方法的转向，如倡议开展进入现场的质性研究。面对这些批评和提议，我们需要慎重思考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是否真的需要转向，是否已经到达了转向的临界点？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转向难道仅仅是指研究方法的转向吗，它需要转向的内容和方向到底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指出，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就狭义内涵而言，是指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的活动和过程。知识生产的技术、知识生产者的类型、知识消费者的满意都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1]反观比较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学术领域，它实质上也是一项生产比较教育新知识的活动。因此，本文将尝试基于知识生产的三大核心要素——知识消费者的需求要素、知识生产过程的技术要素以及知识生产者的人员要素，来理解与把握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未来的转向发展。

一、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转向的动力

对照知识生产三要素发现，当下我国比较教育知识生产的需求变化、方法成熟与队伍发

^①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际大都市基础教育质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ZDA1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马健生，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时晨晨，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学博士研究生。

展分别构成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转向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能性,三者正在共同推进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未来的转向发展。

(一) 转向的迫切性: 比较教育知识需求的变化

知识消费者的需求要素是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它决定了生产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生产知识,是知识生产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概念,“需求”既包含“需要”也涵盖“支付需要的能力”^[4]。那么,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到底需不需要转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比较教育知识消费需要的重大变化以及财政支付能力的条件具备,使转向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1. 教育事业发展新阶段对比较教育知识有新需要

任何一门学术领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中存在的,所以它的知识需要会因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比较教育研究也是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提倡向苏联学习,教育也不例外。所以,研究和介绍苏联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几乎成为当时研究外国教育的唯一任务。^[5]20世纪60年代前期,随着我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外国情况,包括外国教育情况研究的重视,有着明确研究分工与定位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相继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分别对口苏俄和东欧教育研究、西欧和北美教育研究、东北亚(日本、韩国、朝鲜)教育研究。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教育发展急需比较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外国教育改革经验的需求驱动下,研究苏俄和朝鲜等国的教育变得没有出路。所以上述三家比较教育研究核心机构及其创办的比较教育学科主流期刊——《比较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外国教育研究》^①之间的职能分工和研究边界开始慢慢模糊与重合,基本上全都转向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

现如今,我国教育事业已经处在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它迫切需要在更有深度的比较分析框架下来理解和把握自己在世界教育体系中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如何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从而更好地回应整个世界教育风起云涌的变化与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竞争。所以,它对比较教育研究提出的新需要不再是以往简单的“学习与借鉴”,而是更加深刻的“理解与预测”。

2. 国家发展新战略对比较教育知识有新需要
与其他的学术领域相比,比较教育与全球化的联系更为紧密。^[6]这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对比较教育研究疆界的开拓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强大经济活动能力的具备,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开始由过去基于内部资源的自我发展转变到开拓外部资源的全球化参与,加强同东盟、非盟和拉丁美洲的沟通与联络就是重要表现。为响应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也增设了东南亚教育研究、非洲教育研究、拉美教育研究等新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

而后我国更是承担起引导全球化良性发展、造福全世界的大国责任,于2015年正式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未来30年内我国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的后续发展都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展开。而它也给我们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使命和研究任务:比较教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对周边国家教育的研究,起到教育智库的作用。^[7]所以,开辟以往鲜少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是我国比较教育知识的消费者对比较教育研究提出的又一新需要。

3. 财政实力能够支付起比较教育知识新需要
财政支付能力是指公共财政为满足公民社会的某项需求、提供适度财政资金的能力。作为

①《外国教育研究》创刊于1974年,原名为《日本教育情况》,于1983年改名为《外国教育研究》。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而易见,我国具备将上述比较教育知识新需要真正转化为这种新需求的财政支付能力。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有意加大对此的财政投入力度。

为了审视我国教育在世界教育体系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2008年我国教育部决定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统筹的PISA测试,并于2009年和2012年派出上海市以中国上海地区的名义参加。此后,又增派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四省市组成我国部分地区联合体(B-S-J-G,China)参加2015年的测试。2018年,我国更是首次以国家身份参与PISA测试。所以,透过近年来我国政府在PISA测试参与上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不难看出,我国对于寻找自己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的位置给予了大力财政支持。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我国政府除了设立“丝路基金”以专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之外,也对“一带一路”研究给予了大量财政资助。不仅资助各高校揭牌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中亚研究中心、中东欧研究中心、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等,而且也拨付大量经费支持“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作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前每个课题至多获得20万元研究经费,而最近几年政府在基地的“一带一路”研究上总共投入了近400万元,每个课题高达80万元。

(二) 转向的可行性: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成熟

知识生产过程的技术要素是整个知识生产活动的技术支持,是那些为满足和实现知识消费需求的知识生产方法与手段的统称。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性技术,如数据处理设备、实验设施、测量仪器等研究装备;另一类是非实体性技术,如逻辑方法、非逻辑方法、实验与实证等探求新知识的研究方法。^[6]所以,在具备了转向的需求条件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转向是否可行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完善,为转向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1.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积累已经完善

人们通常认为,比较法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事实上,比较法并不是比较教育研究所独有的研究方法,相应地,比较法也不是比较教育唯一使用的研究方法。^[7]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体系,比较教育研究基本上可以通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论,凡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无一不可用于比较教育研究。^[8]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哈罗德诺亚(Harold Noah)和马克斯埃克斯坦(Max Eckstein)在《比较教育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一书中就论述了一般社会科学方法的特点以及如何把它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9]

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以及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理论研究在这近40年中得到不断积累与完善。所以,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不用担心研究方法的理论知识问题,只需要根据研究需要直接选取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即可。

2.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不断多元

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除了理论知识积累已经成熟和完善以外,其实践应用也在不断丰富和多元,尤其是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这两大研究方式的实践应用。

首先,就文献研究而言,虽然它一直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最为主要的研究方式,但此前仅是处于对已有外文资料的“文献译介”层次,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文献研究”。而现在,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Tableau、QuickView、CiteSpace等数据分析软件的出现,文献研究已经开始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被更加深度地使用。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人员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数据分析技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积累的大量国际教育数据进行充分的数据挖掘。

其次,关于实地研究,就整个世界范围来

看,除了传统的文献研究外,实地研究已经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最先提出要开展实地研究的认识,从文献来看应该是出现于王承绪和顾明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比较教育》一书中。它提到“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人甚至提倡引进人类学的方法——现场研究法……例如,要研究一所学校,研究者最好作为一名教员参与该校的教学工作,进行实地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从我国具体条件看,这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10]2002年蒋衡发表的《7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质性”取向》是第一篇向国内比较教育学界系统介绍“质性研究”的论文。随后,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开始不断发文探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并倡议从“文化人类学”“人种志”“地方性知识”“现象学”“民族教育”等具体范式来切入。现如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此前开展实地研究的限制性因素,诸如经费、语言和出国机会等不再是困难,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的专家学者,甚至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有机会通过国家提供的各种资源到国外访学、开展合作研究;实地研究方法也在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对此,甚至有学者声称“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主要以文献为主要研究依据的时代之后,开启了以质性研究为路径的时代”^[11]。

(三) 转向的可能性:比较教育研究队伍的发展

知识生产者的人员要素是整个知识生产过程的现实保障,离开这一认识主体,任何知识的生产活动都不可能发生。^[12]知识生产者的良好理论素养与智慧,以及有效识别知识消费需求和熟练使用知识生产技术的能力,都是满足消费需求的知识生产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需求变化而且技术也支持的前提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转向能不能付诸实

践,在实践中有没有可能呢?非常有可能,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壮大与发展,有能力去促进和引导整个转向过程。

1. 比较教育研究队伍的数量壮大

自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在全国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以来,在这近40年里,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不断增加,截至2018年,全国共设有比较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3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这些学位授权点里除了专职的任课教师和研究人员以外,每年招收的研究生也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的生力军。仅以2018年这一年的招生数量为例,我国32家硕士学位授权点总共招收比较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近200人,8家博士学位授权点总共招收比较教育博士研究生约23人。^①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自1979年成立以后,迄今已经举办过十九届学术年会,参会人员少则四五百人,多则上千人。虽然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目前以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但也有不少教育学其他分支的专业甚至教育学外专业的人士从事比较教育研究,这点可以从近年来比较教育学的专业期刊上作者的单位名称中窥探一二。因此,当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专职人员队伍和兼职人员队伍都在不断发展壮大。

2. 比较教育研究队伍质量的提高

目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不仅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而且也是一支素养良好的队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语水平提高。起初,我国比较教育的兴起,特别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兴起之时,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大都是出身于外语专业。这种“外语化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当时我国外语水平整体欠佳,于是一部分外语水平较高的人便担当起这份责任,率先在国内掀起了从事外国教育先进教育理念、教学思想等方面的翻译和引进工作。^[13]后来,随着我国整个外语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非外语专业出身的人员开始从事比较教育研究,而且他们

①本部分数据是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2018年比较教育学硕士和博士招生数据整理而得。

都能轻松地通过比较教育研究的语言关,熟练地进行外文文献的阅读与写作。

第二,知识结构改善。此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人员的“外语化倾向”虽然在当时对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与经验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缺乏学科背景和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的训练,所做的研究只能是简单的文献译介。此后,随着外语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比较教育从业人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是非外语专业出身的人才,而且也有许多研究人员受到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训练,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4年,孙进对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十七届年会参会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科学习外语类专业的人仅占33.3%,43.4%的人本科所学专业为比较教育学之外的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12.4%的人所学专业是经济与管理类,余下的人分别来自自然科学、农学与技术类专业(3.1%)以及其他专业(7.8%)。^[14]除此之外,受调查者中有71.6%的人表示系统学习过比较教育的相关理论,也有60.4%的人表示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5]

第三,国际学术交流增多。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于1984年正式加入了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WCCES)之后,开始不断加强与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学术交流。一方面,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人员除了积极参与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之外,还参与了包括北美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亚洲比较教育学会、英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协会、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等在内的地区性比较教育学会和各国比较教育协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另一方面,我国比较教育学界也在努力组织各种形式的国际比较教育论坛,吸引世界各地的比较教育学者来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最为人称道的就是2016年8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成功举办了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除了以上这种双向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外,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出国

参观访问和访学,参与在国内外举办的短期研修课程、工作坊和讲座,甚至参加合作研究项目等其他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也在不断增加。

二、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转向的方向

综上所述,在比较教育知识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且能够被支付的迫切性条件下,在研究方法知识积累成熟完善、实践应用丰富多元的可行性条件下,以及研究队伍数量壮大、质量提升的可能性条件下,我国比较教育的知识生产势必将要在许多方面发生转向。

(一) 功能目的的调整:生产教育理论与服务国家战略

做一项学术研究,首先要强调的是研究目的,即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它存在的理由、目的和价值是什么。而这个研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知识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所以,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知识消费需求的变化,决定了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功能与目的需要发生以下调整。

1. 从学习借鉴的“教育信息传播”转向理解预测的“教育理论生产”

此前制约于学习借鉴需求的影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功能与目的主要是通过梳理、概括、介绍国外教育政策及其实践走向的动态性信息,以达到学习和借鉴国际有效经验的目的,进而促进我国教育体系的改进与完善。所以,学习借鉴的对象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很少有同类的发展中国家。而这种基于学习借鉴目的的“教育信息传播”功能定位,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生产出的都是具有所谓“借鉴性”价值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信息,而不是新知识^①,也因此一直饱受学界对其学术性的质疑,一度产生学科危机。

所以,在当今知识消费者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有了理解与预测这一新需求的背景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需要进一步恢复最初的“教育理论生产”功能。这种功能定位要求比较教育

^①本文认为我国比较教育知识生产的产品有三个层次:信息(动态性,是对事实的零散描述)——知识(系统性、结构性,建构了众多信息之间的关系和意义)——智慧(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和判断)。

研究在对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进行分析之后,要上升到一种理论认识、生产出一种新的理论知识,然后再用这种理论知识来指导我国的教育政策与实践;而不是没有来得及克服国外教育经验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就直接对我国教育发展进行“启示”。所以,它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性,淡化学界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功利色彩的认知,而且也能真正助力我国教育政策与改革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2. 不断开疆拓土,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教育知识服务”

显而易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一带一路”倡议对比较教育知识的消费需求,还将决定着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教育知识服务”功能定位,即开疆拓土、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生产出具有“咨询性”价值的知识,以服务于我国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和进程。

研究是交流的基础,深入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的国别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和认识这些国家的教育发展,而且为开展国家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和增进民心互信奠定基础。^[16]但由于此前不仅我国,甚至整个世界比较教育学术界对这些国家的知识积累不多,所以这就需要我国在同这些国家开展教育领域的合作之前从头做起,从头对这些国家教育的基本情况、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改革等进行研究与了解。

(二) 技术路线的变革:开展真正的文献研究与实地研究

做一项学术研究,在研究目的确定之后还要考虑使用何种研究技术与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研究目的。所以,因我国比较教育知识消费需求变化而导致的比较教育研究功能与目的的调整,也相应地推动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未来技术路线的变革。

1. 低层次的“文献译介”提升到高水平的“文献研究”

此前,我国比较教育知识的外部消费者将比较教育研究定位在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以及提供国外最新的教育政

策与实践的动态信息上,而不是生产新知识。它对教育学高深理论知识的消费需求,则往往会要求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来满足。譬如,对课程与教学理论知识的消费需求,会交由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人员来从事对国外先进课程与教学理论的研究,而我国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人员只需提供国外当前最新课程与教育改革的动态信息即可。这也导致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动态信息上往往采用快速便捷、简单粗略的“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式译介(它仍处在文献梳理阶段,并没有开展真正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献研究”(literature research)。虽然这种低劣粗糙的文献译介式学术研究水平低,却能迅速地满足外部消费者对国外快速变动的教育发展信息的消费需求,所以它才能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得以存在,而且一直存在这么多年。

在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知识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为了有效地把握住这一契机、破解比较教育学科危机,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关照外部消费需求的同时,更要重新认识比较教育学科的任务和内在发展需求,进一步恢复比较教育学科创建之初的功能——教育学科科学化的努力,而不是当前简单地学习借鉴。这就要求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要由文献综述式译介转向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文献研究,尤其是在模型或理论指导下的文献分析与数据挖掘,以提升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水准,在兼顾外在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学科内在的学术需求,实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摆脱学科危机。

2. 在远离现场的“文献研究”基础上进行在场的“实地研究”

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在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存在某种联系或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区开展区域教育研究,最好在远离现场的文献研究基础上进行在场的实地研究。首先,从研究目的来看,如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国的教育活动和教育制度,从而便于施加本国的干预和影响这样一种“进攻性”的知识消费需求,那么比较教育研究活动也需要具有开

拓性,通常要采取实地研究的研究方式,进入研究现场以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并收集丰富的研究资料。其次,从已有的知识积累来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研究,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意味着要“开疆拓土”,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这些需要开拓之地,在国际上的研究也比较少,我国研究者对其更不了解,也缺少对它们的理解和接触,因此就需要有在场的、田野的实地调研,因为仅通过文献资料难以满足研究需求。最后,从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来看,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也会投入政策和资金等资源,大力支持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地研究,所以开展实地研究所需要的巨额经费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因此,未来我国比较教育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地研究既需要快速的文献梳理和文献研究,更需要在远离现场的文献研究基础上进行在场的、田野的实地研究,以达到深入了解和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状况,从而更好地与其开展教育领域的合作与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地研究需要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来负责开展;而且从人力、物力、财力节约的角度考虑,也可同其他不同领域的研究团队合作开展。

(三) 人员培养的转变: 兼重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与研究方法的培训

做一项学术研究,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技术路线明确之后,最后还要重视研究人员的可行性,如其理论知识储备、对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掌握水平、外语能力等,都会对研究的顺利完成产生约束性作用。所以,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功能目的的调整、技术路线的变革也将促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培养的转变。

1. 吸纳更加多元的外语人才加入研究队伍

此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中主要是研究欧美发达国家所需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外语语种的研究人员,为了能更好地向“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知识服务,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中要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语语种,如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葡萄牙语等,招募更多这些小语种的外语人才加入

比较教育研究团队中。

事实上,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已经开始行动。2017年该机构在教师和研究人员招聘启事中写道:为积极响应与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学院急需对其沿线国家开展相关研究,希望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外语能力较高的优秀人才加盟我们的研究团队,从事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教育研究工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17]2018年,该机构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也注明:尤其欢迎本科期间学习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阿拉伯语、韩语等小语种专业的推免生前来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18]

2. 强化对研究队伍后备力量的研究方法训练

遵从知识消费需求和研究技术路线的变化,虽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方法的理论知识已经发展成熟,但是在实践运用中还得由研究人员的可行性来约束。所以在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后备力量的培养过程中,要开设相关研究方法课程,加强上述两种研究方法的训练,尤其要加强文献研究中的理论框架或模型指导下的文献分析、数据挖掘能力和实地研究方法的训练。

具体而言,所谓理论框架或模型指导下的文献分析,是指研究者使用某种学科的理论或某种特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相应研究领域某个教育问题的方式。这种研究技术要求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具备灵活应对和有效使用“外来”模型或理论的能力,甚至主动建构模型或理论的能力。^[19]

数据挖掘能力,则是指比较教育研究人员要从大型数据库中提取出有意义的、隐含的、先前未知并有潜在价值的信息或模式的非凡过程。它要求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在较好地把握对象国文化背景因素的基础上,对数据展开深度的挖掘,进而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发现特征,建构新的意义。所以,若想熟练地掌握数据挖掘能力,比较教育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也需要有建构研究领

域新意义的能力。^[20]而这种对全球教育数据的洞察力及解读力将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优势。^[21]

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22]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对研究人员的实践操作能力要求更高。所以在培养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后备力量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能力时,不仅要教授他们相关的理论知识,更要指导他们在实践研究中掌握这项能力。

三、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转向的时代意义

假如上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可能转向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顺利实现,那么它将会产生如下重要的时代意义。

首先,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而言,实现了转向的比较教育知识生产,能帮助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摆脱危机、重获新生。随着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从低层次的“文献译介”提升到高水平的“文献研究”,并在远离现场的“文献研究”基础上进行在场的“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的转向,以及研究队伍后备力量研究方法训练的加强,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将会变得更加规范,将重新赢得学界的尊重,摆脱学科危机,为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作出更好的贡献。

其次,对我国教育事业而言,实现了转向的比较教育知识生产,能够指导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实践的科学化发展。正如英国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 King)所言:“比较教育研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发展方法。”^[23]“一切比较教育的研究都含有改革的意思,否则,为什么费心去比较?”^[24]研究功能目的从此前学习借鉴的“教育信息传播”转向理解预测的“教育理论生产”的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增进对世界教育发展的整体认识与理解,展望和预见教育发展的趋势^[25],并且从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中预测或推演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指导本国的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改革,保证科学性,避

免走弯路。^[26]

最后,对我国国家发展而言,实现了转向的比较教育知识生产,能为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提供知识咨询服务。作为一门最为贴近现实、最能体现时代气息的研究,随着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不断开疆拓土,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知识服务”功能目的的调整,以及我国比较教育知识消费者对此的支付力度加大,未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将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并主动承担更多的使命与任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知识和咨询服务,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Machlup 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145,30-35.
- [2] 李建华. 知识生产论: 知识生产的经济分析框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91,101.
- [3] 王承绪, 顾明远. 比较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16.
- [4] Mark Bray, 阎保华.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教育: 发展、使命和作用[J]. 比较教育研究, 2002(S1):12.
- [5] 顾明远. “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J]. 比较教育研究, 2015(6):2.
- [6][12] 许崑. 试论知识生产的构成要素与特点[J]. 南方经济, 2005(12):53-55.
- [7] 陈时见. 比较教育学[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5.
- [8] 杨汉清, 等. 比较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20.
- [9] 薛理银. 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115.
- [10] 王承绪, 顾明远. 比较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30.
- [11] 朱旭东. 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 质性研究路径选择[J]. 比较教育研究, 2015(11):4.
- [13] 马健生, 陈玥. 论中国比较教育的重生——基于学科制度结构的视角[J]. 比较教育研究, 2015(9):44.
- [14][15] 孙进.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J]. 外国教育研究, 2016(10):18-30.

- [16] 陈时见.“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比较教育研究的视野与路径[J].比较教育研究,2015(6):7.
- [17] 比较教育在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2017年教师招聘启事[EB/OL].(2017-03-16)[2017-09-15].http://www.compe.cn/tzgg/140707.html.
- [18] 比较教育在中国.欢迎推免生和考生报考2018年比较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EB/OL].(2017-09-05)[2017-09-15].http://www.compe.cn/tzgg/146833.html.
- [19][20] 马健生,陈玥.论比较教育研究的四重境界——兼谈比较教育的危机[J].比较教育研究,2013(7):56-61.
- [21] 鲍娟,王正青.“联网+教育”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转型[J].教师教育学报,2017(8):19.
- [22]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28.
- [23][26] 马健生.比较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3,11.
- [24] 王承绪,顾明远.比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4.
- [25] 陈时见.比较教育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7.

On the Possible Tur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A Jiansheng, SHI Chenche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current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has reached the tipping point of turning: The new stag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strateg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oth have new demand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 knowledge, which makes the turning urgent. The maturity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 have makes the tuning feasible. And the growth of numbe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teams have also guaranteed the possibility of turning. In addition, these three forces are driving the following turning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will be adjusted to "producing education theory" and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y". Then, the research technology route will be changed to carry out real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study. Lastly,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ers will be transformed to focus on the d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training of research methods. If these turnings are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y will have important epochal significance: Firstly, helpi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get rid of the "discipline crisis" and regain its new life. Secondly, guid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practice. Thirdly, providing reliable knowledge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hina; research turn; knowledge production

责任编辑:付燕